

田彤 著

转型期文化学的批判

以陈序经为个案的历史释读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期文化学的批判:以陈序经为个案的历史释读/
田彤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6
ISBN 7-101-05283-5

I. 转… II. 田… III. 陈序经(1903~1967) - 文化理论 - 研究 IV.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3859 号

-
- | | |
|------|---|
| 书 名 | 转型期文化学的批判
——以陈序经为个案的历史释读 |
| 著 者 | 田 彤 |
| 责任编辑 | 马 燕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½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 |
| 印 数 | 1-25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5283-5/K·2357 |
| 定 价 | 23.00 元 |
-

序 言

“西化”一词往往引起许多国人的误解甚至痛恶,过去如此,现在亦复如此。而貌似公允执中的“中体西用”,则易于为旧时主流思潮所接纳,且至今仍然有较大的影响。

陈序经正是由于彻底摒弃“中体西用”,旗帜鲜明地倡言“全盘西化”,因而过去成为众矢之敌,现今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很难获致公正的评价。

其实,最先向“中体西用”勇敢挑战,而“全盘西化”的潜台词早已呼之欲出的,应是为戊戌变法献出生命的谭嗣同。

谭嗣同在 1895 年夏天《报贝元徵书》中,明确指出“中体西用”论者的病根,乃是把体、用、道、器之间的关系弄颠倒了。他认为:道必有所丽而后见,“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①他还认为道非圣人所独有,更非中国的私有,因而必以中国之道为体“则大不可”。

^① 谭嗣同《报贝元徵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97 页。

“中体西用”论者最大的心痛是害怕“变夷”，就是被西方文化同化。谭嗣同在这封信中给以开导说：“语曰：‘知己知彼。’先必求己之有可重，而后可以轻人。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即求比列于夷狄犹不可得，遑言变夷耶？”^①

他认为改变害怕“变夷”心态的最好办法是出洋洗脑，并举曾国藩父子、丁日昌、左宗棠、沈葆楨、彭玉麟等大人物的思想变化为例：“历观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识力乃卓。”特别是出使之臣之认识提高更快，如郭嵩焘归国后“拟西国于唐、虞、三代之盛”，薛福成起初亦怀疑此论“扬之太过”，及至自己出使四国以后，“始叹斯言不诬”^②。

民间也有高见卓识者，金匱有个名为裘可桴的举人也敢于对“中体西用”说不，其基本论点是：“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也，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他还很风趣地把“中体西用”比喻为“牛体马用”。

严复很赏识这位举人的高见，并且进一步发挥说：“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有其质干根茎，而后有其支叶华实。使取其辅者与所主者绝不同

① 谭嗣同《报贝元徵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5页。

② 谭嗣同《报贝元徵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8页。

物,将无异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马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晚近世言变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及其无功,辄自詫怪。不知方其造谋,其无成之理,固已具矣,尚无待及之而后知乎。”^①

严复实际上是用社会肌体学的眼光来考察中西社会与文化,把它们看作两个各自具有完整的结构、机制、功能、效应的大系统。这不仅产生了观念的重大变化,而且还体现出思维方法与趋向的根本变化。可以说,他们已经初步突破了道器、体用、主辅等传统范畴的既定格局,并且为中西文化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与新境界。

我不知道陈序经是否注意到严复这些相关论述,但至少说明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并非个人的随意杜撰,实乃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作为“全盘西化”主要理论支柱之一的“文化不可分论”,在严复的言论中已经显示清晰的苗头。但是陈序经在中国社会变迁的新时期,面对着复古守旧的逆流与折中妥协的思潮,旗帜鲜明地高张“全盘西化”旗帜,其勇气,其坚毅,其执着,却是前人所难以比拟的。特别是陈序经为了给“全盘西化”提供更为完备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文化学的学科体系创建方面所做的长期苦心经营,更令人叹为观止。

由于长期经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国人大多对“西化”一词存在极其牢固的警惕乃至憎恶心结。因此,陈序经如此不顾一切地宣扬“全盘西化”,而且还如此坚决彻底地与不同主张流派激烈论战,便必然会变成“全盘西化”的代言人乃至文化符号,因而也就更容易受到误解与无端伤害。就我所知,不少学者并未了

①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559页、559—560页。

解陈序经“全盘西化”的具体内容,但却人云亦云地把他列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反面人物,并且加以简单粗暴地批判。这不仅是陈序经个人的不幸,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学人的悲哀。

就整体而论,我并不赞同“全盘西化”;但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我却能理解陈序经苦心孤诣之所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传统守旧势力根深蒂固,而复古倒退的逆流亦颇为强势。在走出中世纪的艰难而又曲折的漫长路程中,需要有更大的与旧文化离异的力度。陈序经呼唤的便是这种力度,亦即破旧立新的彻底性。陈序经也承认:“西洋文化不是绝对的最好的文化,不是绝对的完全的文化”,“西洋人对于西洋的文化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如果与中国、印度、非洲各种文化相比,“还是最好与完全的文化”,可以成为后者“理想的文化”。这当然是以现代化为标尺来做的比较,不可与从古至今的整体比较混为一谈。而且陈序经所强调的西化,主要是指近代西方文化那些业已形成“共同的基础”、“共同的阶段”、“共同的性质”、“共同的要点”的基本要素,如民主、自由、社会主义乃至持续不断的自我完善与自我超越等等,并非胡子、眉毛一把抓,样样照搬照套。这些都说明,“全盘西化”自有其立论依据与内在序列,并非是杂乱无章的错误堆积。

近些年来有关陈序经的论著为数颇多,但大都就事论事,就人论人,或褒或贬,皆很难超越近百年体用之争的范围。本书结合陈序经本人的学术主体实践,把有关“全盘西化的争论”纳入转型期文化学建构的总体中来加以探讨,境界较高,层次亦深,故能体现新的路径与创意。

作者不畏艰难,广事搜求,尽可能阅读所有陈序经已出版的论著以及大量未经刊行的手稿,在占有资料方面也取得较大的优势。而且在使用史料时尚已注意必要的考证与鉴别,这样就使其宏观

研究建立在必要的实证基础之上,读来并不觉得空泛,而确有实际心得。

本书没有停留于对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剖析与品评,而是进一步对陈序经所建构的新进化论文化学的体系与内容做了细密的梳理与整合。这样便不仅对陈序经研究有进一步的推展,而且对中国文化化学这一新学科的探讨亦有所裨益。

但由于文化化学本身就是一门尚未成熟定型的新生学科,其研究对象包罗万象极为广泛,而且涉及到社会学、人类学等众多相关学科,特别是陈序经与之有较深渊源的那些外国重要学术专著(未经中译者),应该尽可能逐一认真阅读,这样才有可能真正从源头上厘清陈序经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并作高屋建瓴的俯瞰评析,在这方面作者表现出功力尚有不足之处。

我对陈序经未曾做过系统研究,以上所言无非是比较表层的读后感,不当之处尚祈作者与多方先进给以指正。

章开沅

2006年盛夏于溪口剡水客舍

目 录

序 言	章开沅(1)
导 论	(1)
一 研究缘起	(1)
二 学术史的检讨	(14)
三 基本思路和方法论	(26)
 第一章 中国近代文化学的产生	
一 文化学的源流	(31)
二 中国近代文化学的建立	(43)
三 中国近代文化学流派	(65)
 第二章 陈序经的文化学体系及其内在贫困	
一 知识背景与思想资源	(74)
二 文化学体系	(88)
三 文化学的话语解说系统及其内在贫困	(108)

第三章 陈序经的文化学与中西文化观、历史观、社会观

- 一 文化学与中西文化观 (123)
- 二 文化学与历史观 (146)
- 三 文化学与社会建设 (158)

第四章 陈序经的“全盘西化”与教育观、学术观

- 一 “全盘西化”的内涵 (176)
- 二 个人主义与文化主体 (187)
- 三 西化教育 (196)
- 四 学术西化 (205)

第五章 陈序经的文化心理结构

- 一 文化创新与相关心态 (213)
- 二 独立品格 (228)
- 三 文化心理的集团动力 (250)

结语:转型期的思考 (271)

主要征引史料及参考文献 (285)

附录一:陈序经著作年表 (304)

附录二:陈序经未刊手抄稿纲目 (310)

后 记 (320)

导 论

一 研究缘起

近代中国处于由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时期,遭逢着前所未有的全面的社会变革。近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在中外学人的译介中竞相崭露头角,即是这一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指征。

20 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学人们热烈追求各种理论期以解决现实问题,社会科学运动由此勃兴^①。《中央日报》在原“大道”副刊基础上特辟“社会科学运动”栏目,这种具有政府性质的导向更是对该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科学运动使三十多年前以个体为主的译译工作,一变而为群体行为,几乎所有的文化精英都厕身其间。“不数年间,译著之书汗牛充栋,学校设专科,各地立学会,一时青年群趋此

^① 杨幼炯《社会科学与出版界》,《现代评论》第 5 卷第 117 期,1927 年 3 月 5 日,第 19—20 页。

途,俨然成为一时风尚”^①。1933年,中国经济学社、统计学社为促进全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分工合作,在南京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1934年底,会员多达402人。黄文山、程瑞林等人1933年在南京创办中国社会科学社,出版《社会科学》季刊,会员有64人。杨幼炯等人1935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会,会员多达130人^②。文化精英大多对社会科学运动寄予无限热望,拟以此探寻“中国民族文化衰落之历史原因”,“求根本解决的具体方针”^③,祈盼通过灌输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使中国步入“现代民主的政治社会”,以社会科学运动“发展中国学术”,掀起“一个科学的文化运动”,“促进民族低落已久的文化之进步”,“建设适应于全体人类的永久生存之中国民族的最高生存意识”^④。

随着社会科学运动的推展,西方大量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著作快速而广泛地传入中国,如爱尔武德的《文化的进化论》在其出版后仅一年的1928年即有汉译本出版,其理论、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些文化精英认识中国的理论衡器,为文化精英反思以往的文化论争及今后的走向,产生了不容低估的或隐或显的作用。中国的文化学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萌生和发展起来的。陈序经、黄文山、孙本文、朱谦之、陈高僖等人,都在主、客观上成为文化学的引介者、中国文化学的拓荒者和不同派别的典型

① 陈高僖《中国文化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4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40、742、841、846页。

③ 章渊若《新中国之建设与社会科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会之使命》,《中央日报》1930年3月16日,“社会科学运动”第11期;杨幼炯《社会科学发凡》,大东书局1933年版,第64页。

④ 杨幼炯《社会科学运动之意义》,《中央日报》1929年10月16日,“社会科学运动”,创刊号。

代表。但迄今为止,中国文化学的学术史还未引起学人应有的注意和深入研究。之所以选取陈序经为个案加以考察,是由其自身无可比拟的特性所决定的。

陈序经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少有的一位中西兼通的大师级学者和教育家。

陈序经祖辈世居海南岛文昌县瑶岛。家族中颇多南洋华侨,其父陈继美也长期客居南洋经商,经营种植园。陈序经 1903 年 9 月 1 日降生在这个家道殷实的华侨家庭。4 岁入私塾启蒙,6 岁随父去新加坡读书。1912 年回国入读文昌汪洋致远小学和模范小学。1915 年随父侨居新加坡,先后在育英学校、道南学校、养正学校和华侨中学学习,成绩优异。因为其父不愿子弟接受殖民教育,1919 年送陈序经回国。1920 年陈序经考入四年制广州岭南中学,直接插入三年级学习。为了寻求更浓厚的读书氛围,他未及中学毕业,便于 1922 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1924 年因不愿入基督教转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很可能在这一时期开始植入陈序经的思想中,并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价值取向。1925 年他提前从复旦毕业,同年 8 月在父亲的鼓励下留学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社会学。1926 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而后专攻主权可分论,于 1928 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回国,受聘岭南大学社会学系。1929 年又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政治学、主权论和社会学。一年后到德国基尔大学的世界经济研究院研习。1931 年 6 月因病回国,仍任教岭南大学。陈序经虽任教于社会学系,但也曾应神学院院长龚约翰(J. S. Kunkle)的邀请,为神学院学生讲授过一个学期的中国文化史^①。他本想按父亲愿

^① 陈序经《有关岭大与钟荣光的几点回忆》,《广州文史资料》第 13 辑,1964 年 11 月,第 38、50 页。

望再去英、法等国继续深造,因其父猝然离世,留学计划中辍。1934年夏转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教授、研究主任,兼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为商学院学生讲授社会学和乡村社会学^①。1938年执教于西南联大,主讲主权论、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原理、文化学和华侨问题等课程,并担任过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1944年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去美讲学一年。1946年出任南开大学教务长,主持经济研究所和政治经济学院^②,被张伯苓倚为左右手。1948年8月,岭南大学美国基金会鉴于陈序经的教育思想、行政能力、学术地位及广泛的社会关系,聘任他为岭南大学副校长,一年后正式接任原校长李应林的职位。陈序经执掌岭南大学期间,在保证学校财政不透支的情况下,重新组建医学院,加强对文学院及其他学院的建设,建立商学院。在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实施的同时,他说服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留在岭南大学,并动员联大毕业生从美国回国任教,拒绝将岭南大学迁往香港^③。这一时期学校的学术气氛等许多方面均超过战前水平^④。1952年院系调整,勃勃朝气的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序经成为历史系一名研究教授,他全力筹建东南亚研究室。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出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兼任暨南大学校长。

① 逢锦聚、梁吉生《陈序经与南开大学》,陈传汉等《东方的觉醒——陈序经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延边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②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276、311、312、313、317页。《陈代校长八一莅校视事》,《岭南大学校报》康乐再版号第81期,1948年9月10日,第1版。

③ 林元《碎布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④ 李瑞明《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年版,第116—118页。

1964年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序经曾任广东省文教委员会委员^①,第一、第二届广东省政协常委和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期间,陈序经因岭南大学那段经历和“全盘西化”的尾巴,被迫接受专案审查,1967年含冤离世,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昭雪,被誉为热爱祖国的优秀教育家,一位在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贡献卓著的学者和东南亚与华侨问题的专家。

陈序经治学严谨、思想广博、视野宏阔而又多产,其论著涉及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历史学、教育学等诸多方面且每有心得。不过,在他一生的学术思想中,最有争议而又引领东西文化论争潮头的还是他在30年代提出的“全盘西化”论。其实,更为重要的,是“全盘西化”论背后的一套完整的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可以说,陈序经的“全盘西化”与其文化学是一个互相促动和丰富的因果之链。

陈序经的有关文化学研究不是书斋闲趣,而是充满着对现实的热切关注,这是与特定的个人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

陈序经的早年迁徙生活为其文化学的研究涂上了最初的底色。穷乡僻壤、繁华都市、海南渔港、南洋群岛、贫寒蛋艇、新异欧美,不同的生活环境让陈序经强烈感受到各种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反差,使他萌生出对文化的兴趣。陈序经“自小就有一种厌恶洋人的心理”,也曾因入读洋人开办的学校仅三天就“死也不愿再读下去”。但当他来到广州后,发现想象中的广州竟远不如新加坡整洁有序,不禁感叹“像新加坡这些为洋人所统治的殖民地,尚能有条有理”,以致“不能不开始怀疑我们自己的文化”,“感到西化的

① 广东省公私立高等学校教职员概况表、履历表草表、中南区广东省行政人员登记表,岭南大学陈序经材料,38—4—5,第100—102页。38为岭南大学全宗号,4为目录号,5为案卷号,广东省档案馆藏。

必要”，“出乎包括自己在内所有人的意料”，“决定要入注重英文的学校”^①。这是他选择岭南中学的朴素动机。而美国汽车、洋房、电器和能歌善舞的民族，使陈序经在美国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面前，不免对传统文化黯然神伤，“觉得中国西化的必要，全盘西化的必要”^②。留学前，陈序经即常阅读有关文化的著作。留学美、德后，他对东西文化问题尤为注重，并发表过《孔夫子与孙先生——欧游杂感之一》、《东西文化观》等论文。其中，他于1931年发表的《东西文化观》一文中，尝试借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等基本理论，剖析中西文化的异同，明确提出了“全盘西化”论^③。1931年底完成八万余字的纲领性著作《中国文化的出路》。父亲的豁达和远见曾是他学术追求的巨大精神动力，他希望以此为礼物报答父亲教诲之恩。岂料书未出版，一场意外医疗事故夺去其父生命，陈序经因心愿未遂，抱憾终生。残酷的刺激足以成为陈序经坚守“全盘西化”论的心理转折点。这一偶发事件不仅使他感到个人精神的失落，而且也感到中国文化精神的失落。他内心积蕴已久的对中国文化清算的决心因此而弥坚。“何况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都可以说是生存在我们因袭的固有的文化和目前中国的奇形怪状的文化之下的无数牺牲者中一个。所以不但是为了中国文化的前途计，我很深切的相信我由这些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就是为了个人幸

① 陈序经《东西文化观》第五部《全盘西化论史略》，手抄稿（对照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卷刊载陈序经与胡适的通信稿知，南开大学图书馆藏陈序经书稿非其自己手抄，故不曰“手稿”而称“手抄稿”），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② 陈序经《东西文化观》第五部《全盘西化论史略》，手抄稿，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③ 陈序经《东西文化观》，《社会学刊》第2卷第3期，1931年4月，该期无总页码编号。

福计,我尤相信、而且诚恳和坚定的相信这个结论。个人而尚不应该死的时候而死去了,是不可复返的;但是整个的中国的固有文化走错了路,却未必是再没有希望的”^①。为深化该书所讨论的问题,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基础上先后写成《南北文化观》和《东西文化观》,于1935年和1936年刊登在《岭南学报》上。

陈序经的文化主张固然是文化比较的自我体认的产物,但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复古的社会趋向和学术风气的回应。初到西南联大时,陈序经曾对友人说过:“现在有一股‘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的复古思潮,这是‘五四运动’的逆流”,“提出‘全盘西化论’,主要是针对这股思潮的”^②。

复古逆流并未因新文化而崩殂,而是与之如影相随。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曾一度通令学校习经、祀孔。1927年初,大学院以“孔子尊王忠君,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通电全国各教育机关废止祀孔。原本合乎时势的教育部令却引起甚嚣尘上的抵制之声,中国社会涌动着一股不可逆转的复古气息。福建、四川等地政界、地方士绅以至军界人士、中华总商会首发其端,对大学院横加指责。更有甚者,孔教总会还呈请国民政府“令飭全国学校一律添习经学,以正人心,而存国脉”,“恢宏固有道德,固有文化”,“以济科学物质文化之穷极”。在时人眼中,复古情形“较之

① 陈序经《〈东西文化观〉的跋》,手抄稿,南开大学图书馆藏。该跋因编排在陈序经手抄稿《南北文化观》之后,杨深在《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将其误作为《〈南北文化观〉跋》。另可参见陈序经《我怎样研究文化学——跋〈文化论丛〉》,《社会学讯》第3期,1946年8月1日,第2—8版。

② 林元《碎布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